

抗战时期的微山湖秘密黄金运输线

肖守宁



黄金作为金融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在稳定国家经济命脉、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它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抗日战争时期的微山湖秘密交通线,就承担着运金延安的重大历史使命。

运金之缘起:内外交困下的必然选择

受严峻的战争形势、贫瘠的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位于延安的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军队的经费一直非常短缺。特别是到了抗战中后期,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企图从经济上困死边区和党中央。

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尤其在弹药、医药购置和外事处理等问题上,更是举步维艰,因为这些事项只能用黄金和外汇办理。开采和收集黄金这一硬通货,便成为当时缓解财政困境的重要措施。

位于胶东半岛的招远地区,自古就是中国著名的黄金产地,有“金都天府”之称。1938年夏天,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和拮据,向党中央提供山东的黄金,支持延安的财政经济,意义重大。

1940年,中共中央组织选派近百人的中央财经工作团赴山东,争取向中央输送比较充裕的现款和“通货”。毛泽东认为,“把票子搞到延安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来比较好。”内外交困之下,从山东抗日根据地向延安源源不断输送黄金,已是势在必行。

运金之斗争:掠夺与反掠夺

面对日伪军的军事占领和疯狂掠夺,胶东区委组织部向敌占区金矿派遣得力人员,团结采金工

人乃至爱国资本家,与日伪军展开惊心动魄的黄金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

胶东区委先后成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玲珑采金局等组织,统一领导招远的黄金生产。胶东党组织采取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黄金生产措施,除了实行个体生产外,还有由采金局出资办的公营金矿,采金局和矿商联合办的公私合营金矿,矿工集资办的合作社金矿,以及矿商自办的私营金矿。

鼎盛时期,矿点达到200多个,投入黄金生产的人数大约有3万人。这些生产组织每年的税金(主要是黄金)也有数万两。胶东党组织还通过秘密潜入金矿,带领矿工智取黄金;从玲珑金矿到龙口港,沿途伏击敌人运金车队,武装夺取黄金。胶东党组织专门建立了负责收购黄金的地下收购站,通过多种形式与日寇和私商争购黄金。

运金之路线:胶东至延安的交通线

运金延安是一项特殊而又高度机密的工作,整个运金路线由多段秘密交通线串联而成。从胶东把黄金安全运到延安,全长2000多公里,需要穿越上百道封锁线,一路充满艰难险阻。

其主要运金路线是:一般先在招远等地通过各种形式筹集的黄金,集中到中共胶东特委(区委)驻地或指定位置,然后通过“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送到山东分局,然后由山东分局经微山湖和湖西根据地,抵达冀鲁豫边区,之后再转往太行山地区和延安。

纵观黄金运输线全程,它主要由“渤海走廊”“滨海通道”、湖上交通线和冀鲁豫边区交通线构成。从冀鲁豫到了太行山是比较容易走的,只要一过平汉路就到了。到了太行山,回延安最艰苦的阶段就基本上过去了。

微山湖秘密交通线地处苏鲁豫皖4省交界,是当时华中、山东通往延安的必由之路和交通枢纽。它东起津浦铁路沙沟站以西的彭楼村,西至

湖西单虞根据地,水路15公里,陆路70公里,分为湖东、湖上、湖西3段,它见证了刘少奇、朱瑞等我们党高级干部携带黄金路过的艰辛和从容。

1939年3月19日,刘少奇同志从苏北返回延安时,深知党中央经济上的极端困难,在离开山东时,就将山东分局筹集的1万两黄金带回延安。在微山湖停留期间,刘少奇作“五点指示”,要求地方组织和游击武装,要千方百计保住这条水上交通线,掩护过往的领导干部和部队。

1943年9月24日,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也经由这条交通线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在微山湖畔的蒋集村休息时,朱瑞把中共湖西地委组织部长陈璞如的爱人苏健叫到跟前小声说:帮我办件事,你到老家借点针线来,我有用。

苏健赶忙借来针线,递给朱瑞。正要转身离去,朱瑞又说道:你别走,我的眼不好使,手又拙,这事还要请你帮忙。他从腰里解下一个黑布袋子,沉甸甸的,有两个破洞闪着金光。

见苏健露出惊异的神色,朱瑞小声说:这里是金砖(一寸宽,二寸长),你可要保密。我主要担心有人见财起歹心,这是准备上交党中央的经费。我们党财政太困难了,处处需要钱啊!

作为专注研究秘密交通线的学者,南开大学孙健伟博士在《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一文中指出:纵观黄金运输线全程,它主要由湖上交通线和冀鲁豫边区交通线构成。由以上史实和相关学者研究,我们完全可以把微山湖秘密交通线称之为微山湖黄金运输线。

运金之贡献:十三万两黄金的重要价值

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黄金运送的高度保密性,胶东向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输送多少黄金,确实已经无法搞清。但是,依据现存史料,特别是当事人的大量回忆,我们仍可以梳理出当年运金延安的大概数目。

据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主任秘书谷牧回忆: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

孙健伟博士通过潜心研究,发现1945年胶东区委机关报《大众报》曾对运输黄金做过一个很准确的统计:胶东的金矿现有大小矿洞百余处,平均每日共可产金35两,每年产量达12000余两。全面抗战八年中,仅胶东地区就产黄金10万两左右。

这和谷牧当年回忆的数据是吻合的。另据《中共烟台历史大事记》记载: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胶东拿出13万两黄金,分别送往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烟台文史资料》第五辑中也写道:据当年从事收购黄金的几个老干部估算,1938年至1944年,在日伪严重破坏和奸商倒卖的情况下,招远共筹集上交黄金13万多两。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抗战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至少向党中央上缴黄金13万两,按16两1斤的旧制,约为4.3吨。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畅教授,对13万两

黄金的实物价值进行过专门研究。按照中共《陕甘宁边区九年财政收支报告》,1943年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分别约为32.01亿元、50亿元(边币)。

1943年至1944年政府规定边币与法币比价大致围绕10:1波动,以此计算,1943年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分别约为3.2亿、5亿法币。

再按照1两黄金等于1.75万元法币计算,1943年3.2亿法币折合黄金18285两(1.8万两),也即13万两黄金约为陕甘宁边区1943年财政收入的7倍。按照1942年滨海区的实际购买力折算成粮食的话,分别约可以购买5.99亿斤小米、6.5亿斤高粱、4.99亿斤小麦。

山东抗日根据地地了抗日的大局面,勒紧腰带向中央输送了这么多的黄金,是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在抗战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罗荣桓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山东管的黄金是给中央送的,一两也不留,要全部上交中央。黄金运送部队都接到过这样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透露运送的时间、地点和部队番号、兵力和交接的过程。携带黄金的人都曾立下“宁丢性命,不丢黄金”的誓言。

漫漫运金路,没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事件,没丢失一两黄金。他们用实际行动树立了金子般的坚定信念,锻造了对党清澈纯净的绝对忠诚,体现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精神特质。山东军民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使命的伟大品格,理想信念高于天的革命情怀,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山东军民用鲜血与生命领导和护卫的黄金通道,以及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也必将成为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①②为打破封锁,延安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资料图片



《薯乡杨柳》,泗水之滨的流行歌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炊烟云袅处,斜插篱笆墙,我爱这清新质朴的薯乡……”当秋日午后的暖阳映照在大地上时,在泗水县杨柳镇的现代化社区里,传来了一阵欢快柔美的歌声。

原来,这是泗水县杨柳镇宣传科的干部郝禹霆在教社区居民唱歌。郝禹霆唱的,是由杨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蔡键创作的歌曲《薯乡杨柳》。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像一缕清新和煦的风,在杨柳镇的田间地头荡漾开来。

“咱有自己的镇歌啦,唱的就是咱的薯乡……”大伙觉得这个事新鲜又亲切。杨柳镇为啥叫“薯乡”?这就得说说杨柳镇的拿手产业——甘薯加工,“小甘薯”在杨柳镇成就了“大气候”。

乡村振兴,产业必先行。说一千道一万,农民致富最关键。杨柳镇的甘薯产业做得有多大?这是乡亲们最自豪的话题,全国最大的甘薯加工基地就在这里。

那《薯乡杨柳》这歌,又是怎么个来历呢?这几年,杨柳镇找准了甘薯产业融合示范区这个目标,走上“龙头企业带动、社会资本注入”这条路,用镇村干部常给大伙说的话,就是以党建促

产业、以产业带民富,打造泗水县薯乐田园(甘薯产业融合示范区)项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大伙常挂在嘴边的“薯乐田园”,就成了蔡键创作《薯乡杨柳》的灵感源泉,他想把老少爷们最喜欢的事写成一首歌。在接受《文化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蔡键坦言,自己没有接受过作词方面的专业教育,创作过程中最大的压力来源于尺度的把握。

这首歌既要全面展现薯乐田园作为泗水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又一新亮点,又要以外界易于接受的艺术风格来呈现。于是,他写完歌词就向省音乐家协会求教,从谱曲、演唱到后期制作,人家都给予技术指导和支持。

这样一来,专业的精巧补上了“业余”的粗糙,反复修改几十遍,历时一个月终于完成了。《薯乡杨柳》中,细说了杨柳镇乡村振兴。薯乐田园示范区以“45年老店”、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司为带动,构建了甘薯“育苗、种植、储销、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

龙头企业辐射带动10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联盟,建设甘薯育苗大棚80亩,农耕体验区1000

亩,村民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门口务工赚薪金的双重收入,探索出了“龙头企业+农户+基地”的共富路径,实现了村集体、龙头企业、农户三方共赢。

泗水县去年成功入选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连续举办四届中国甘薯产业发展大会,成功创建“全国甘薯产业科技研发基地”“全国甘薯新型食品加工示范基地”等4个国家级品牌。

“柳絮”牌粉条、粉条以及甘薯蛋白、膳食纤维等高端保健产品,十大系列300多个品种,畅销全国各地并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综合加工能力60万吨,甘薯产业产值47亿元,辐射带动农民4.3万户,14.2万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万元。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培育打造特色鲜明的“仓储、物流与电商发展”的新模式,现代化仓储物流保鲜库和传统土窖,全镇甘薯年保鲜存储能力达到30万吨。

建立电子商务销售和直播带货平台,通过抖音、快手、淘宝、京东等平台将甘薯及其制品销售到全国各个省份。春节前后,泗水蜜薯需要“抢购”,1公斤能卖到20元。歌词中的“看不够万亩平原好粮仓”,一句话概括了杨柳镇的地理优势。

杨柳镇是泗水县唯一的平原乡镇,耕地5.8万亩,2021年被评为全市耕地保护激励乡镇,是名副其实的粮仓,适合种植甘薯、玉米、小麦、瓜菜等农作物。薯乐田园项目区规划建设面积1700亩,涉及14个村,5000农户,项目总投资5亿元,一期投资1.27亿元,打造甘薯种植及农耕文化研学体验基地、甘薯博物馆、主题酒店、乡村振兴学院、蔓游杨柳时光片区。

二期投资3.73亿元,主要打造甘薯主题商业街区、薯乡民宿、花海码头、绿道及驿站。全面建成后可接待游客15万人次,新增1000个直接就业机会、3000多个间接就业机会,可实现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增加2000元以上。

“幸福杨柳,自信薯乡”,是蔡键基于杨柳镇的真实情况写下的:近几届党委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张蓝图干到底,才有了如今整整齐齐、有产业有发展的文化特色村”,前琴柏村建起了孔子学堂(琴柏书院),后琴柏村民孙凡合获评市级非遗(柴烧儒窑)传承人,杨柳镇也获评市级文化建设样板镇。

如今的杨柳镇,不仅甘薯产业做大做强,文化“两创”也蓬勃发——小庙前村列入“第二批山东省红色文化特色村”,前琴柏村建起了孔子学堂(琴柏书院),后琴柏村民孙凡合获评市级非遗(柴烧儒窑)传承人,杨柳镇也获评市级文化建设样板镇。

“泗河水一路欢歌流淌”,灵感来自济宁人乔羽先生的“一条大河”,写的是杨柳镇乡亲在母亲河边的生活变迁。杨柳镇盘活驻地存量闲置土地,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迅速拉开了现代化小城镇发展框架。

通过商业开发、挂钩置换、棚户区改造等方式,杨柳镇先后实施杨柳新苑和杨柳东苑一期、二期社区建设,完成7个村的撤村并镇,镇驻地人口达到1.2万人。镇驻地学校、医院、康养中心、大型商超、酒店齐全,驻地周边落地了众多大小企业,百姓生产生活实现了大变革。

“碎花田在田野里开放”“田野从翠绿到金黄”,都是肉眼可见的景象,是杨柳镇和示范区的新美景。

记者来到薯乐田园项目三产文化博览休闲区,右手边是总占地5700平方米甘薯广场,由薯乐田园游客中心和甘薯休闲广场组成。位于休闲广场中央的5个大地瓜雕塑,寓意杨柳镇5个甘薯类规模以上企业发扬坚韧不拔、埋头苦干的甘薯精神,团结一致发展壮大。游客中心总面积1000平方米,集引导、购物、购票、停车等功能于一体,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服务。

“十里红椒俏画廊”“薯蔓延伸的方向”,写的是杨柳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让美丽乡村变成美丽田园。甘薯加工废弃物循环利用,建立荷塘净化种植藕、塘内营养龙虾的立体循环经济。

记者了解到,薯乐田园示范区2个村建成景区化村庄,7个村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其中核心区的孔家村是省级旅游村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就像青春少年,奔赴诗和远方。鲜衣怒马,不负韶华向前方。”蔡键说,希望这首歌曲用朴实的文字、优美的旋律、高昂的歌声,表现杨柳镇落实市县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坚定决心,唤起干部群众对家乡的热爱,为家乡泗水变得更美丽、更富裕贡献一份力量。



邹城,历史悠久,文蕴深厚。灿若星辰的文化名人,妙趣横生的文化故事,为社会、为当代贡献了许多原创的思想精华和名言警句。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当你不经意间,可能就踏在了古代圣贤名士的脚印上。

邹城地域文化,是大中华文化之下,的一个文化分支,是经过漫长历史形成的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从地域文化海拔不高,但文化之峰高点众多,可以说是灿烂辉煌、博大精深。具体说来,可用一源、三流和多点概括。

一源。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文化、根文化。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发祥地——郭里,既有聚落遗迹、后裔繁衍,又有祭祀庙宇和传说故事。

在郭里爷娘庙村南,有传说中伏羲女娲“滚磨成亲”的老磨盘。《邹县志》载:“人祖庙,祀伏羲,亘古今存。”据考证,郭里伏羲庙重建时间,比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至二十年——1483年甘肃天水伏羲庙建筑群,建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河南淮阳伏羲庙建筑群建设时间早几个朝代。

三流。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释、道为两翼的文化,当然也有诸子百家为补充的多元文化。“孔孟之道”成为儒家文化的代名词,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

孟子,邹人也。孔子生于鲁,居于鲁。因建尼山水库,1968年,济宁地区将“现属邹县田黄公社管辖的十个大队155个村庄44个生产队,1480户,6626人,耕地面积7115亩,划归曲阜县统一领导”。所以,孔子诞生地原属今邹城,现属曲阜,另有火车站广场“孔子诞生双圣碑”留存。

多点,即多元文化谱系。母教文化、孔孟弟子文化、邹鲁文化等,丰沃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文化圣贤。古之“邹鲁”,由地域之名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之一。

“邹鲁”二字,不仅是地域名称,也是文教兴盛的代名词,文化概念的符号。在2000多平方公里200多年的时光里,诞生了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5位圣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地域文化,对内是凝聚力、向心力,对外是宣传力、影响力。在地域文化的深层比较中,才能感受到家乡文化灿烂辉煌的特质,才能树立“舍我其谁”坚定文化自信、擦亮地域文化名片的责任意识,使“邹鲁”特色文化更有特色,优势文化更具优势。

邹城地域文化藏在地方文化学者心中。家乡文化是更作用于人的文化,人有各种情感,丰富多彩,亲情、友情、恋情……那么,最深厚、最无私、最慷慨、最永恒的便是故乡之情。

乡愁不是忧伤,也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对家乡文化的深情之感。邹城最难得的是有一批无私、执着、不计得失的文化人……埋在心底的乡情、痴情,用“拾古”的文章或书籍奉献给社会,确乎值得钦佩。

邹城地域文化藏在乡人的胡子中。有些县志、村史等在典籍里,但更多的风土民情、轶闻趣事、民间传说甚至神话故事的文化碎片,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藏在乡人的胡子中。

邹城地域文化藏在有形、无形的古村古镇中。传统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连接着所有炎黄子孙的精神根脉,凝聚着所有大步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人的乡愁。建设美丽乡村,“美”在自然,“根”在文化,“富”在产业。一眼老井、一棵古树、一条老街、一座祠堂或破败不堪的房舍……可能都深藏着文化。

传统的地域文化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纯粹的地理空间的概念。当新时代全球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入生活方式,也迎来了多元文化并存激烈碰撞的时代。“传承”二字中的“传”和“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是无条件的铭记、保存、保护,是历史记忆;“承”是有条件的,是去粗取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为新时代服务的价值观念。